

華僑論文集

(第二輯)

广东华侨历史学会

目 录

- 孙中山与华侨.....廖 钱 (1)
- 美国华人历史与社会.....成 露 西
(美国华人) (27)
- 孙中山与美国华侨.....张 瑛 (139)
- 缅甸华侨与辛亥革命.....肖 泉 (181)
- 华侨与保皇会初探.....周聿峨 (213)
- 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和贡献.....郭景荣 (229)
- 加拿大温歌华中华文化中心的作用、
形式和意义.....肖永坚 (284)
- 华侨与广东地区辛亥革命运动.....黄庆云 (296)

孙中山与华侨

廖 钺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坚持进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近代史上华侨爱祖国爱故乡的朴素感情和反清倾向，发展到直接支持辛亥革命运动而达到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新高峰，是与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在广大侨胞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分不开的。

一、中国往何处去

古老的中国走进近代史门坎的时候，就象风雨飘摇的破船在资本主义世界海洋里打转。它的自身由于长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造成国家极度积弱无能；而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的袭击，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进攻，又使它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这穷途末路的情况下，1851年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曾企图打破这个昏暗垂死的局面，奋起推倒大清帝国。这一农民革命虽然震撼着清王朝的心脏，为中国近代史潜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的革命史诗。可是，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狭隘性带来革命不彻底性和农民绝对平均主义和皇权主义的局限；特别又由于清朝反动的湘淮军勾结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了。在此之后，还有种种色色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寻求救国之道。有的属于封建王朝的奴才们，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洋务运动，还有过“五大臣出洋”考察洋务的闹剧。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这就是这帮人迷梦的结局。也有一些好心人提出什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向西方学习，如此等等的“改良”路子；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留洋学习的科学家，象詹天佑那样的爱国的工程学家和一些实业家，在近代中国的生产建设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充满着复杂错综的矛盾：一方面小农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虽有新兴的资本主义民族经济萌芽，但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桎梏和绞杀，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包围，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宰割下，封建锁国，闭关自守既不可能；通过自然发展走上资本主义社会，更是此路不通。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

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缓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现实是无情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凶狠地打开之后，首先城镇手工业和农村的农民家庭手工业遭到了像洪水猛兽的外国商品的冲击、排挤而奄奄一息。中国民族工业想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就象那种“蜗牛爬行的进度”（马克思）也已不可能了。事实证明：“中国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英国）货物贵得多，我们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中国）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地下降了。”（引自邵循正：《1845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随着侵略者的逐步深入，洋铁排挤土铁，洋糖代替土糖，轮船驱逐旧式的帆船”（《辛亥革命史》上册第6页的引文）。这样一来西方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致使中国社会内部萌芽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能得到顺利的兴起和发展，甚有一蹶不振地根本给予绞杀了。

其次，鸦片和商品输入的另一结果，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这又使封建统治者加深对国内人民疯狂地敲骨吸髓地剥削压迫，加以帝国主义接连不断的侵略、野蛮烧杀、掠夺、大皇赔款……这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无穷灾难，进一步迫使中国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加速破产、失业，饥饿而颠沛流离、转徙逃荒和人口严重外流出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灾难深重国力日蹙的中国，往何处去？成为中国人民迫切地要回答的问题。当时处于民族意识

和爱国主义思想高涨的仁人志士都着急寻找答案。

无疑地走上了时代潮流前列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他们力图以资本主义社会去取代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帝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走国家民族独立的道路。这该是唯一的出路了。

孙中山是站在这条道路上的斗争前面的第一个英雄人物。

二、改良幻想的破灭

孙中山从小接受过“洪杨”农民革命思想的启蒙。在少年时代他就是一个对封建迷信的叛逆者。他对人“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从刊〕第一册，第24页）在青年时代他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教育，还特别由于他是一个华侨。他十二岁出国，在檀香山将近六年，后在香港一年。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学习和生活中，他开始直接体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文明。他又曾“目击殖民主义者在夏威夷歧视和荼毒当地土著居民和华侨的暴行，又对欧美资产阶级的殖民制度深感愤恨，并寄同情于夏威夷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转引自《辛亥革命史》上册第76页）。这时，他体察了国家民族独立主权的神圣，而对华侨社会，对华侨的爱国本质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这些当时属于民主思想和进步社会生活的熏陶，使得孙中山从青少年起就

成为怀有大志的一位朴素的民主主义者。

正因为他起初还是一个朴素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投身于革命实践之前，还不可能完全脱离“改良”的幻想。一八九四年他上书李鸿章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上李鸿章书》）。但他提出这些革新主张，以图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难而被漠视之后，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改良的幻想破灭了，从而使他认识到非暴力不足以推翻帝制。他的朴素的民主思想产生了飞跃。他“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他鲜明地认识非走革命道路不可了。

1894年11月孙中山进一步考察了中国的国情之后就再一次出洋去檀香山并着手组织革命团体了。他在火奴鲁鲁曾邀集何宽、李昌、邓荫南、郑金、程蔚南、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在界涉银行何宽经理寓所开会，会上提出“振兴中华”，首组革命组织“兴中会”。这时孙中山对于“革命”不但从思想上得到充分的认识，就是从行动上也得到了组织的保证。他起草的一份《兴中会章程》既是一份革命的行动纲领，又是

一份声讨清廷的慷慨陈词的檄文。他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因可以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就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兴中会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产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又面临着中法、中日两次战争中，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从而更坚定的“始决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之志”，民主革命乃以波澜壮阔之势开展了它的积极活动。

早期，1895年孙中山以香港、澳门为基地就密谋了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但这一起义由于事泄流产。他被清廷缉捕，被迫流亡海外。首次发难的失败又使得孙中山了解到，在封建残酷统治下，人民群众没有长时间的发动和锻炼，猝使革命成功于一旦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封建淫威下，企图顺利地立足于封建堡垒内发展革命力量也是不容易的。他只好转移国外为基地，立足于华侨社会中积蓄革命力量了。一九

〇〇年他又利用义和团运动的有利时机，“以为时机不可失”发动了第二次的武装斗争的惠州起义。惠州起义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高涨。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而信心百倍地说：“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

义和团运动乃为封建顽固势力所利用，愚弄和出卖的结果，失败了。惠州起义也失败了。但革命形势却得到迅速发展。孙中山及时地“专从联络留学界及海外华侨入手，以培养人才解决资金问题”（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27页）。他进一步在日本、越南、檀香山、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发展了革命团体，表明了联合华侨救国的意旨和途径。

三、华侨是革命力量的源泉

近代中国的海外华侨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华侨出国的高潮差不多同资本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拓殖和美洲的开发是同时产生的。而且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海禁大开，沿海居民无以为活，漂洋过海出国谋生的众多。帝国主义为掳掠中国的华工，不断的和昏庸腐败的清王朝订立了华工出国的不平等条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与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承认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别地

做工。1866年英法与清政府签订的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五款便说：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自便，不得禁阻”。这样便为殖民主义者假招募之名行掠取我国沿海劳动力（猪仔）贩运到南洋、美洲等地大开方便之门之实。十九世纪末，汕头“每岁附轮往外洋者四、五万人”。（谭钟麟：《复查广东会匪在澳门、香港聚众滋事片》，《谭文勤公奏稿》卷17、第26页）。泉州一带人民“每年正、二月间附轮出洋者以万数计”（《申报》1895年4月1日），“据关册记载，仅厦门一地，1905年前后，每年出口人数就达十万人左右”。（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179页）。据估计十九世纪以来一百多年间被掳掠贩卖的“猪仔华工”共达三百万人。加上其他原因出国的海外华侨到清末，辛亥革命前分布在世界各地共有六、七百万人，其中90%在东南亚一带。

广大华侨侨居异国，饱受着种种压迫和剥削，特别是猪仔华工的命运是十分凄惨的，正如马克思在1875年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受欺骗而跑到外国去工作的华侨，在秘鲁沿岸和古巴被卖去充当奴隶，过着最苦的生活，备受欺凌，直至残杀。”（《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菲律宾华侨压迫的政策和罪行》一文）。

国家的积弱无能，使他们生活生存权益得不到保护和支

持，清政府甚至竟以“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

（《外交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0期《旅居南洋华商呈商约大臣公禀》），把华侨当为“化外之民”。这些广大的被遗弃的“海外孤儿”的悲惨处境，塑造了他们念念不忘家乡田园庐墓，而怀有“排满”的浓厚情绪，和渴望祖国强盛，有朝一日能够保护海外赤子的强烈的爱国思想。这种情绪和思想，实质是一个广泛深厚的民主革命力量的源泉。

事实告诉我们：如华侨邓荫南曾说的：“甲午中东战起，感祖国之危亡，慨然有澄清之志，会先总理抵檀倡革命，心折之，订生死交，而愿倾家以助”。（《邓荫南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五册，第1225页）。邓荫南的这些意见，实可以代表广大爱国华侨爱国的心理和要求。更可以看到当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发展同盟会组织时便有许多华侨争先加入同盟会。如马来亚华侨有郑螺生者首先加入同盟会。在越南的华侨，如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韦云卿认为孙中山讲演革命道理“顿悟人民责任”，立即加入同盟会。吉隆坡七十余岁的老华侨阮英舫，“一听总理革命道理，便欣然率他的二位令郎阮卿云，阮德三加盟”。（《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第539页）。侨居缅甸华侨听到组织同盟会从事革命的消息，喜形于色，纷纷报名参加，七日之内，就有五百多人参加组织。（李德贤：《同盟会在缅甸仰光活动概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72页）。一九〇六年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分会时，曾向加盟

者指出：“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即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群众受到极大的振奋。（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第10页）

孙中山立足于海外华侨社会积蓄革命力量的思想，和广大华侨的原始爱国思想是有着本能的共同之处，因此革命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来看，始终取得华侨的积极支援和参加。

四、和保皇的斗争

“保皇”和“革命”的斗争是民主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的一场曲折复杂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还表现在华侨社会里面。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相继逃亡到日本。他们就以海外喘息的机会，在华侨社会中继续卖力推行其保皇的破烂，煽惑群众。初期孙中山也受了他的某些迷惑，认为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他推诚相见，并于1899年冬，在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檀香山组织保皇会时，他还给梁写了亲笔信。康、梁凭藉孙中山作为幌子，蒙骗不了解国情的华侨。他们以革命派对保皇派还缺乏认识的情况下使劲鼓吹“孙康合作”，“孙梁合作”，“保皇实则革命”等蛊惑人心的言词以发展保皇会，并阴险地争夺“兴中会”大部份的会员。19世纪末，20世纪的开初，保皇势力在南洋、美洲华侨中谋获了很大发展，从而美洲的兴

中会因保皇会猖獗而“销灭于无形”，横滨兴中会员也“泰半加入”保皇会，（见廖平子《美洲兴中会历史》），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这时恰好又是在国内的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这不能不是孙中山初登上革命舞台中的一种内外交困的挫折。但孙中山并没有为一时的逆境所吓倒；相反的，在失败中取得了教训，更为他以后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就使他更清醒识别了保皇派的真面目和争取群众划清保皇和革命的斗争的界线而努力。

为了布置这一斗争，1902年孙中山特派毛文明前往檀香山进行“扫除保皇邪说，恢复革命机关”。1903年9月孙中山来到檀香山，亲自主持这一斗争。他在希炉埠一经宣传“阻力渐去”。他艰苦深入细致地进行教育群众工作，他“亲往其耕寮、邀集侨农，竭力开导，往来跋涉，不敢告劳”，后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千余人，盛况前所未有。孙中山还在檀香山各地开展强大的宣传工作，他深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并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当年孙中山是从日本经檀香山到美洲和保皇会展开大论战的。孙中山并亲自在《檀香山报》（原为隆记报）撰文论辩，先后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等文章，给保皇派迎头痛击。

《敬告同乡书》一文针对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严正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大悞也”。“彼辈所言保皇为

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二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在《驳保皇报》里，他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其实“所爱之国为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批判所谓革命可召瓜分的谬论，认为“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列强因‘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而‘贪欲无厌’，‘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有力地驳斥了保皇派攻击革命的一切谬论。经过这场大论战，把保皇的毒焰打下去了，曾经一时受骗的华侨纷纷觉悟，登报声明与保皇脱离关系。“美洲广大华侨‘大为醒悟’的情况下。檀香山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建国月刊》第6卷，第8期，第8页）

“公理愈辩愈明，保皇遂一蹶不复振，革命党则蒸蒸日上”（《纪癸卯总理重至檀香山事》）。特别孙中山还成功地把在美洲占人数众多的，仅美国即达数十万人的“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之八九”的致公堂（洪门，天地会组织），从保皇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他亲自加入洪门，改组致公堂，亲订致公堂新章。《新章》规定“本堂以驱除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把一个有强大势

力的封建性的会党组织，改变为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这是美洲华侨社会中，革命精神前所未有的发扬，革命力量迅速增长的结果，也是孙中山的果断和坚毅斗争的结果。

在南洋各地革命派和保皇派斗争也取得了辉煌胜利。据孙中山自己的回忆里说到：与1900年以前相比“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孙中山在一场划清革命与保皇的艰苦斗争中夺取了胜利。这表明了革命派在政治斗争上已经成熟。

和保皇论战后，人们“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必要者”，（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1978年版，第198页），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五、革命高潮的到来

1894年甲午战争后“欧洲资本家的贪婪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这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从兴中会到1903—1904年和保皇派的大论战分清了革命和保皇绝不相容的大是大非之后，广大华侨民智已开，纷纷觉醒，奋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导致了1905年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的诞生。同盟会时期“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喜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

之唯一上策”(廖平子：《北美洲各埠欢迎总理筹款事略》，《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12册，第427页)。当时由孙中山起草的盟书，标明革命的坚定信念，“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忠矢勇，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这份盟书实是代表了广大华侨决心革命的誓言。同盟会在海外得到迅猛发展。在南洋各地“凡华侨所到之地方，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第42页)。革命形势非常高涨，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接连的在粤、桂、滇三省边界就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一九一〇年又在广州发动了新军起义。这些起义正是得到东南亚华侨人力物力的支持的。这一连串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对唤醒南方各省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侨投奔革命洪流却起了重大作用，并推动了以后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广大华侨从这些起义斗争实践中，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为国为民的覆灭清王朝的波澜壮阔的斗争。这几次起义的失败无疑也取得了经验教训致使孙中山更能高瞻远瞩地看到革命高潮中的大好形势，从而更信心百倍地领导革命向前发展。他说：“一败何足馁，吾辈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第180页)时隔

不久，到了第二年，1911年4月27日，他又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即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

这一起义的七十二烈士中，有二十九名是华侨。这些烈士英勇无比，气贯长虹，光照日月，彪炳寰宇，悲壮英烈。如马来亚矿工温生才，于黄花岗起义前的1911年3月在广州刺杀水师提督李准，结果误杀了清将军孚琦。当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审讯他为什么要暗杀，他回答：“不是暗杀，是明杀”。问什么叫“明杀”，他当场痛骂，“满清无道，昭外侮”。黄花岗之役的斗争中，吉隆坡华侨李晚扛起起义大旗走在队伍前头勇敢冲锋，终于牺牲。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在巷战中打死很多敌人，自己身上中了几枪，流血不止，还奋勇杀敌，直至战死。河内华侨罗联作战中被捕，清水师提督李准审讯他始终不屈，刑场上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

为什么他们这样赴火蹈汤而不顾一切？就是因为民族危机太严重了。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已经走上“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绝境。皇帝这个曾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也已经不灵了。人民打破了皇权思想，要想求得出路，就只好横下一条心拼到底，非彻底打翻这个阎王殿不可了。这一“拼”，也正如谭嗣同的“冲决网罗”的彻底的“暴力”精神所反映的当时爱国报国的仁人志士的总的思想状况和英雄气概。这种思想的发展也正是从“拼死一击”变为有革命宇宙观、人生观为内容的完整的“革命暴力观”，变为有组织的革命群众力量。这又是孙中山领导的起决定作用的革命